

郭璞研究



• 连镇标 著

SANLIAN WENBO LUNCONG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璞研究/连镇标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96-X

I.郭... II.连... III.郭璞(276~324) - 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134 号

郭璞研究

著 者/连镇标

丛书策划/苏 梦

特约编辑/姚大勇

责任编辑/刘宏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校对/黄曙辉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订/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0

印 数/1-3100

ISBN7-5426-1696-X

C·28 定价:20.00 元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1)
序	穆克宏(1)
第一章 坎壈一生 壮心不已	(1)
第二章 辛勤笔耕 硕果累累	
——郭璞著作探考	(9)
第三章 含英咀华 博大精深	
——郭璞思想探考	(95)
第一节 郭璞儒家思想考	(95)
第二节 郭璞道家思想考	(117)
第三节 郭璞道教思想考	(145)
第四节 郭璞易学思想考	(166)
第四章 景纯仙篇 挺拔而为俊	(201)

第五章 弘农辞赋 中兴之冠	(240)
第六章 沾溉神话 瑰宝溢彩	(263)
第七章 道德文章 泽被后世	(298)
后 记	(302)
主要参考书目	(304)

第一章

坎壈一生 壮心不已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公元 276 年，即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卒于公元 324 年，即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享年 49 岁。郭璞出身非豪门望族。其父郭瑗，晋初任尚书都令史^①，终官建平（今属四川省）太守。郭璞青少年时代，大抵上没有离开家乡闻喜。其时社会环境表面安定，郭璞的家庭生活条件随着郭瑗官职的升迁逐步获得改善，这就为郭璞潜心治学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史称，“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1899 页）。据说，其时有个叫“郭公”的人，客居河东，精于卜筮，郭璞跟他学习。郭公授以《青囊中书》九卷，郭璞因此擅长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同上）。

晋惠帝、怀帝之际，河东一带发生骚乱。匈奴左贤王刘渊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在离石（在今山西省）起兵反晋，

^① 据段熙仲考证，令史有如后代的书吏，供写书。都令史在宋代官不过七品，位在郎下，禄不及四百石。据此，郭瑗的出身可以说是贱客。

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进据河东,攻陷蒲坂(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入都蒲子(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永嘉二年(公元308年),迁都平阳,即皇帝位,国号汉。闻喜离刘渊的大本营平阳不远,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郭璞不能不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预知“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同上),但作为寒门细户,他无力回天。郭璞在政治上既没有唤起民众抵御异族入侵的号召力,在经济上也没有力量招兵买马筑堡自卫,为保全身家计,他只得“潜结婚昵及交游数十家”避地东南。

郭璞离开家乡闻喜,取道猗氏(治所在今山西猗氏南二十里),越南山(即中条山)之高岭,抄焦丘(又作焦邱,在今山西省)之径道,经解池(即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县境内)、河北(在今山西芮城县),渡黄河,过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陟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东抵洛阳。在洛阳盘桓期间,写下《流寓赋》,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从老家闻喜逃难到洛阳的沿途见闻,抒发了自己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尔后,郭璞又向东南进发,到达庐江(在今安徽省)。当时江淮一带表面上“清宴”,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咨祭酒,安于现状,无心南渡。郭璞借卜筮警告胡孟康,兵燹在即,坐守必败。胡孟康不信,郭璞只得促装而去。后数旬,庐江果陷敌手。

郭璞南渡长江,直抵宣城(在今安徽省),宣城太守殷祐引为自己的参军。不久,郭璞离开宣城东下。当时晋元帝司马睿尚以琅琊王的身份镇守建邺(今南京),任丹阳太守的王导颇为赏识郭璞的才华,让他参己军事。洛阳、长安相继失陷,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先后被匈奴刘曜所俘,神州半壁河山落入异族之手,西晋终于灭亡。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建

康(今南京市)自立为晋王,翌年称帝,是为晋元帝。对中原的沦陷,郭璞痛心疾首,悲愤万分,在《答贾九州愁诗》中写道:“顾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网既紊,浮颿横腾。运首北眷,邈哉华恒……乱离方歊,忧虞匪歇”;对东晋新王朝,郭璞寄以收复失土、振兴晋室的厚望,在《与王使君诗》中希望王导佐助晋元帝完成统一大业,并积极为之出谋划策:“怀远以文,济难以略。光宝岳谟,折冲帷幕。凋华振彩,坠景增灼。穆其德风,休声有邈。方恢神邑,天衢再廓。”他不遗余力为东晋新王朝唱颂歌。先是著《江赋》,述长江之美,“其辞甚伟,为世所称”(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01页),极大地激发了群臣庶民戮力晋室的爱国主义热忱;后复作《南郊赋》,盛赞东晋王朝的开国大典,为司马睿登台歌功颂德,晋元帝“见而嘉之”,任命他为著作佐郎(数年后又擢升为尚书郎)。但东晋王朝并无一点革新气象,统治者步前朝之后尘,以酷刑重法镇压人民,加上太兴初年江南灾荒频仍,而朝廷却赋敛不已,百姓困苦不堪。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郭璞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机会,多次上疏晋元帝,请求省刑减赋,实行大赦,驱逐奸人,以正视听。《晋书》本传称他“数言便宜,多所匡益”。这一切无不表现了郭璞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郭璞晚年遭母丧去职,择葬地于暨阳(在今江苏江阴东),把他母亲和哥哥的尸骨安葬在那里。他服孝未满周年,便被盘踞荆州的王敦起用为记室参军。王敦是个极端残忍、凶狠的军阀、野心家,对朝廷夙有二心,郭璞对此早有所觉察,只是慑于其权势,不得不在其幕府供职。但他仍心系晋室,处心积虑为司马氏集团效劳,所以当新即位的晋明帝司马绍派人征求他的政见时,郭璞即上疏请求改年肆赦(改年号,藉以向世人表明司马氏政权

的延续、强大,非王氏豪门所能动摇;肆赦,旨在笼络人心,巩固东晋新王朝)。而当王敦反叛阴谋豁露时,朝廷重臣温峤、庾亮欲讨王敦,让郭璞占他们二人的吉凶,郭璞说“大吉”,以神明的力量鼓励他们的举动,坚定其必胜的信心,促使朝廷作出讨伐王敦的决策(年轻的晋明帝司马绍正是在温、庾二人的力劝下,才下决心讨伐王敦的)。与此相反,当王敦欲把反叛阴谋付诸行动时,亦叫郭璞占筮,郭璞却说“无成”,假天意予以阻止。王敦本来就怀疑郭璞暗地里鼓动温峤、庾亮讨伐自己,又闻卦凶,大为不悦,乃让郭璞卜寿命。郭璞不假思索答道:“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往武昌,寿不可测。”(是说,根据刚才占卦的结果看,您要起事的话,不久必遭祸殃死去;倘若退驻武昌的话,您的寿命长得很)其旨在敦促王敦撤军返荆,远离建康,以解除对东晋首都的威胁。王敦大怒,反唇相讥:“卿寿几何?”郭璞知道王敦决心要杀他,便毫不畏惧地答道:“命尽今日日中。”王敦怒不可遏,当即收捕郭璞,诣南冈斩之。平息王敦之乱后,朝廷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

有人认为,郭璞是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牺牲的,成为晋室的忠臣(或曰:郭璞是处在政治矛盾的夹缝里,像嵇康等人一样作了时代的牺牲品),不能如与他齐名的刘越石(刘琨)那样,留在敌后,力图恢复,为民族的自由而死,是值得惋惜的。笔者不同意此种看法。诚然,郭璞是在司马氏政权与豪门王氏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其动机是为了维护东晋王朝的利益,但客观上也是维护江左半壁河山的完整,有了江左作根据地,才有可能收复失土,完成统一大业。如果东晋王朝内乱不已,势必给外族野心家南侵提供机会,这不啻是永嘉之乱后的又一场民族灾

难。故郭璞此举^①于国于民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仅以“晋室忠臣”目之。他与刘琨，一南一北，一文一武，都是为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统一而死，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当然，其死的价值亦不能与嵇康等量齐观。

纵观郭璞一生，才高命舛，仕途偃蹇，终其一生不过是王敦幕府中的一名记室参军。何以如此？《晋书》作者认为这是郭璞自身的原因：“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04—1905页）从古到今都有人持这种看法。但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郭璞的行为有失检点。众所周知，魏末两晋社会玄风大炽，所谓名士文人，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一味追求任诞旷放的生活。东晋道士葛洪对此作了生动而真实的叙述：“（名士）蓬发乱鬓，横挾不束，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闾閻修业，改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拔森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嘯傲纵逸谓之体道。”（《抱朴子》外篇《疾谬》卷二十五，上海书店1986年版《诸子集成》第8册第149—150页）即使在达官贵人中，亦不乏此种人。其放荡狂妄的程度与郭

① 指郭璞通过占卜活动，促使温峤、庾亮讨伐王敦，竭力阻挠王敦反叛，乃至杀身成仁。

璞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仕途。如,号称“八达”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其日常行径无异于禽兽^①,但他们多为东晋王朝所器重,封侯赐爵者大有人在^②;周顗的私生活放荡^③,令人恶心,但仍贵为尚书左仆射。这就足以证明,行为放浪不羁,乃晋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纵容和默许。因而《晋书》本传称郭璞的“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也决非是其仕途偃蹇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乃是晋代的门阀制度在作祟。两晋社会承袭了曹魏九品官人法,取士用人,重门阀,重出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在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方面确保了高级士族世代不易之特权。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寒门与世族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森严的阶级鸿沟,两晋历代统治者谁都不想去填平它。

① 《晋书·光逸传》载:“(光逸)初至,属(胡毋)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② “八达”之一的阮瞻,为太子舍人;光逸,累官至给事中;胡毋辅之,历任安东将军、咨议祭酒、扬武将军、湘州刺史;谢鲲,生为豫章太守,死后谥号太常;阮放,生为吏部郎、交州刺史,死后追赠廷尉;桓彝更是大红大紫之人,晋元帝时为中书郎、尚书吏部郎,明帝时为散骑常侍,封万宁县男、丹阳尹、宣城内史,死后追赠廷尉。

③ 《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有人讥周仆射(周顗)“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忤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

这就注定了郭璞一辈子不可能获得高官要职。更何况东晋王朝是草创于江左的新政权,皇室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而门阀势力却更强大,对皇权的威胁也更明显。为了维系脆弱的江左小王朝,东晋皇帝必须依赖南下的北方大士族以及土著的南方大士族的支持,必须让这些高级士族分享政权。故郭璞虽千里迢迢来投靠东晋新王朝,但因他不属于南渡的北方大士族之列,仍不得司马睿、司马绍父子的重用。最能说明这问题的一件事,是晋明帝司马绍在东宫时(即做太子时),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郭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温、庾,成为士林一段佳话。可是司马绍当上皇帝后,温、庾二人都被擢升,先后执掌朝政,而郭璞却被冷落一旁,屈居下僚。其原因就是温、庾乃南渡的北方豪门望族。

此外,郭璞之所以终其一生无法跻身于重臣之列,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统治者眼中,他乃一介方术之士,属社会末流,不能登高堂殿宇。郭璞“妙于阴阳算历”,在治学门径上承袭了汉儒董仲舒的阴阳灾异学说,祖尚京房《易》象数学,兼综方术,精于卜筮,成为儒术与方术混而不分之大家。但其社会地位却远不如其先师鼻祖。在汉代,董仲舒为今文经学大师、一代大儒,汉武帝奉若神明;京房因占术精湛,曾一度博得汉元帝的宠幸,出入宫廷,品评权贵,踌躇满志,世人亦竞相学习京氏象数学。但自魏始,由于失去统治阶级的支持,儒学呈现出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儒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作为从儒林衍生出来的方士,更为世人所不屑(曹操还曾一度把各地的方士术者拘禁在京都,以防其作乱)。而郭璞立身行事,往往以方士面目出现。“璞消灾转福,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房)、管(辂)不及”(《世说新语·术解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诸子集成》第8册《世说新

语》卷五第 184 页,上海书店 1986 年版),这与世人心目中的儒家形象大相径庭。如此之人,即使对于打着尊儒旗帜、企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东晋统治者来说,亦失去了利用价值,充其量只能让他当一名临事卜问吉凶的术者,而绝不能让他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否则有损朝廷声誉。故终其一生不过是王敦麾下的一名幕僚。这跟汉武帝把大学问家东方朔视为插科打诨、消愁解闷的俳优,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章

辛勤笔耕 硕果累累

——郭璞著作探考

郭璞一生勤于笔耕，著作颇丰。据《晋书》本传载：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房）、费（直）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①、《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②。

但遗憾的是，郭璞上述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佚殆半。此外，晋后历代亦间有托名郭璞的著作产生。这就使得今人对郭著的真伪难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郭璞文学成就和学术思想的认识和把握。

鉴此，笔者据历代史乘艺文志的记载，对郭璞各种著作的写

① 一作《三仓》。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10页。

作时间、地点及其流传的情况,逐一考证,庶几有益于学术界。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按郭璞著作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文学类和学术类两大类,在每大类下又分若干种类。

一、文学类。

这里指郭璞的诗赋和政论文,它包括:诗、赋、疏、表、策及赞。下面逐一考证。

1. 诗。

A. 游仙诗。

南朝梁萧统《文选》收入郭璞游仙诗,计七首,皆五言。据明张溥辑录的《郭弘农集》、近人丁福保辑录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晋诗》,郭璞的游仙诗有十四首,均为五言诗。这些诗长短不一,句数多寡不等,或十六句,或十四句,或十二句,或十句,或六句,或四句^①。细读这些诗,我们不难发现,张溥、丁福保辑录的游仙诗,未必每首皆完整,尤其是末尾四首诗(即:《登岳采五芝》、《四溟流如泪》、《静叹亦何念》、《纵酒濛汜滨》),都有“意犹未尽”之感,很可能是残篇佚文。这四首诗不仅内容上略嫌单薄,无法与它诗博大深沉之涵容量相比;而且篇幅短小^②,前二首只有它诗(十六句)的四分之一,在体制上与多数游仙诗不协调。这对于同一作家创作同一体裁的作品来说,是难以存在这种情况的。尤其是享年不长的郭璞,一边要从事文学创作,一边要钻研语言科学,这就不允许他不断变换创作的“套路”;严谨的

① 郭璞十四首游仙诗中,十六句的有二首,十四句的有六首,十二句的有一首,十句的有一首,六句的有二首,四句的有二首。

② 《登岳采五芝》、《四溟流如泪》每首仅有四句,《静叹亦何念》、《纵酒濛汜滨》每首也只六句。

治学态度也不可能使其文学水准大起大落,艺术家的良心亦不允许他把“意犹未尽”的“半成品”推向社会、抛给读者。故我们不能把郭璞游仙诗的末尾四首视为完整无缺的“成品”,而只能看作是流传过程中“失腿掉臂”的“残品”了。

今人逯钦立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入了郭璞游仙诗十九首,比张溥、丁福保辑本多收了五首。这五首诗分别引自《韵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文选注》。遗憾的是,这五首诗亦是残篇佚文,或四句,或二句,甚或一句之中还脱漏数字^①。其他十四首,与张溥、丁福保所收的相同。特别是前十首,其次序、文字亦相同^②。这说明前十首诗,自古迄今被公认为完整无缺^③。而另外四首残篇(这里指张、丁、逯本均有收入的),逯本编排的次序与张、丁本不同,这显然是别有用意的。逯本把张本的末篇与第十一首调换了位置,并把上述自己多收录的五首诗中的一首置于前头,于是逯本所收录的九首残诗的次序如下:

① 这五首诗是:(一)吐纳致真和,一朝忽灵蜕。飘然凌太清,眇尔景长灭。(二)放浪林泽外,被发师岩穴。仿佛若士姿,梦想游列缺。(三)翘首望太清,朝云无增景。虽欲思灵化,龙津未易上。(四)安见山林士,拥膝对岩蹲。(五)啸傲遗俗罗,得此生。逯按:第五首诗的第二句“得此生”前当脱二字。

② 逯钦立与张溥所辑录的郭璞游仙诗前十首,只有三处文字不同:第八首“纵情任独往”,句中的“任”逯本作“在”;第十首“解褐被絳绡”句中的“被”逯本作“礼”,“绡”逯本作“霄”。

③ 拙文《郭璞著作探考》写于1996年,笔者近日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亦云:郭璞游仙诗“今存完整者十首,《文选》录其七,另三首存于《初学记》、《诗纪》、《广文选》等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一) 吐纳致真和，一朝忽灵蜕。飘然凌太清，眇尔景长灭。

(二) 纵酒濛汜滨，结驾寻木末。翘手攀金梯，飞步登玉阙。左顾拥方目，右眷极朱发。

(三) 四渎流如泪，五岳罗若垤。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

(四) 静叹亦何念，悲此妙龄逝。在世无千月，命如秋叶蒂。兰生蓬芭间，荣曜常幽翳。

(五) 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散发荡玄溜，终年不华皓。

(六) 放浪林泽外，被发师岩穴。仿佛若士姿，梦想游列缺。

(七) 翘首望太清，朝云无增景。虽欲思灵化，龙津未易上。

(八) 安见山林士，拥膝对岩蹲。

(九) 嘯傲遗俗罗，□□得此生。

逯钦立之所以颠倒前人编排的次序，是认为《吐纳致真和》、《纵酒濛汜滨》、《四渎流如泪》这三首残诗本为一篇^①，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将其“一分为三”，肢解了它。但逯氏又缺乏证据，不敢擅自把这三首残诗合而为一，于是就在这几首残诗的次序上做文章，可谓用心良苦。据笔者看来，逯氏的“三合而为一”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从形式上说，这三首残诗联起来共十四句，与郭璞大多数游仙诗的句数同；从内容上说，这三首残诗联

^① 逯按：以上三则当为一篇。

起来的话,生动而完整地描绘了一个修道之士羽化蜕变、飘然升天、寻仙结友的全过程,披露了诗人对修道成仙的企慕之情,表达了自己与世俗之辈彻底决裂的决心。其立意谋篇,与第九首《采药游名山》^①有相似之处。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借助某种修道之术(或呼吸吐纳,或服食玉液琼浆)而成仙,遨游太清,悠然超脱,但最后又都不得不正视现实而感到悲哀,以至“与时人绝”(即与浊世决裂)。故这两首诗,可谓“姊妹篇”。

可以肯定地说,郭璞的游仙诗远不止上述提到的十四首或十九首。郭诗既被钟嵘《诗品》称为“中兴第一”,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而郭诗的主体可能是游仙诗,其游仙诗又被后人视为我国游仙诗发展的顶峰,就决不可能仅凭十多篇游仙诗获此殊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引用的郭璞的两句诗:“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②,在今存的张溥、丁福保、逯钦立本中就找不到。又如,唐人编纂的《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郭璞诗“翩翩寻灵娥,眇然上奔月”,是地道的游仙诗句,但今存的各种郭璞集子中都未收入。

那么,郭璞游仙诗在流传的过程中,何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散佚现象呢?笔者以为,这固然有兵燹战乱、社会变迁诸因素,更重要的是人为的因素,即人的好恶(尤其是历代统治者的意志)在作祟。这可以从钟嵘对郭璞游仙诗的评价中看出端倪。

① 郭璞《游仙诗》之九:“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骊,迅驾乘奔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轡,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② 钟嵘《诗品》卷中《晋弘农太守郭璞》,引自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